

第一章 引言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大国，在 21 世纪即将到来的今天，每位中国人都关注着新世纪中国的命运。面对着激烈的国际竞争，人们更深切地体会到“发展是一个硬任务”的内涵。更为有效地配置利用资源，并通过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保证资源的有效利用已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然而文化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往往为人们忽视，甚至有些人认为关注文化，或人文关怀是后现代社会的特征，只有发达国家才有可能考虑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建设，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其首要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少数人还错误地理解古人“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含义。究其错误原因，即尚不清楚什么是文化，不清楚文化与发展有何内在关系？孰因孰果，还是互为因果？简要地阐述这些易于混淆不清的论题，不仅有助于理清人们的思路，而且也是设定本书核心概念所必须。

1.1 对文化的解释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离不开文化，但文化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关于文化的概念一直是许多中外学者讨论的问题，古今中外不同学科的学者根据自身的角度给文化下了不同的定义，有人统计只是国外的学者给出的文化定义就有 200 多种。但无论文化的定义有多少种，归纳起来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所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之总和，这就是广义文化的概念。而相

对应的狭义文化即指精神文化。

依据上述文化的定义，我们可以列举出许许多多的文化事象。如帮助人们认识世界、规范人们社会行为的语言、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哲学、道德、法律、信仰等，又如体现人们美学感受的文学、音乐、戏剧、美术等，还有可以反映社会组织形式的制度、机构，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和生活工具、设施，以及制造和建造它们的生产技术。这些文化事物和文化现象虽然可以分为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但是任何物质文化事物都一定程度地反映精神文化的某些方面。反之，许多精神文化事物也具有它们的物质形式。图 1.1 是一个简单的文化结构图，本书涉及的文化是指图中的非物态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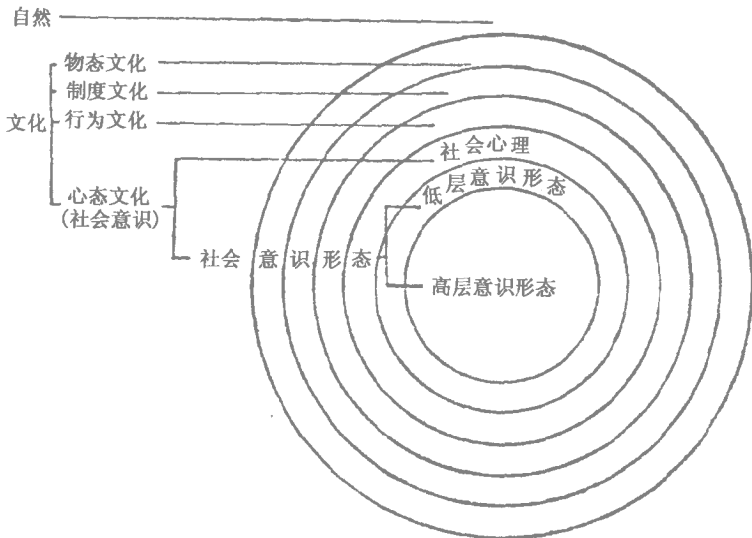


图 1.1 文化结构简图

(引自冯天瑜, 1991)

若干彼此联系的文化事象组成文化综合体，如吴方言、淮扬菜系、江南民间艺术等文化事象组成了江浙文化综合体；若干文化综合体又可组成文化体系，如关东文化、齐鲁文化、鄱阳文化、燕赵文化、淮河流域文化、吴越文化、黄土高原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中原文化、荆湘文化和闽台文化、西南少数民族农业文化、西部游牧文化等（王会昌，1992）都可以视为文化体系。

由图中的内容我们可以了解文化几乎囊括了人类社会的所有方面，因此许多学科都将文化作为它们的研究对象。经过长期的研究和激烈的学术争论，学者们在文化学上基本达成了以下一致认识：第一，文化一般是有适应性的，它适应着特定的自然与社会环境条件。但是适应于一个社会的文化，对另一个社会就不见得适应。有些文化特质从适应意义上是中性的，有些只在过去适应，还有一些根本就不能适应。第二，文化大多数是整合的，这是因为构成该文化的要素或特点大都是相互适应和和谐一致的。第三，文化是在不断变迁的。也有的学者将之称为文化的假说（Ember, 1985）。正是基于这样的假说，我们探讨地方与文化发展才有前提。如果文化与所在地方的其它社会环境要素没有关系；如果文化没有社会适应差异，没有空间的差异；如果文化一成不变；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在这里谈一个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干的、恒定不变的因子与地方发展的关系呢？

2 对地方的解释

“地方”(local)似乎是一个空间的或地理的概念，但它与“区域”(region)的概念还是有区别。本书中的“地方”特指与“中央政府”相对应的下级行政区。因此区域更像一个“纯”地理的概念。如果用地理学专用术语讲明它们的本质区别，那就是“地方”为机

能区(function region)；“区域”为规范区(formal region)^①。机能区与规范区的形态学区别表现为前者有明确的边界，后者边界模糊；它们的功能区别表现为前者具有较强的自组织性，后者基本没有组织机能。因此说，我们将讨论的各个空间单元均是边界清晰的地域。由于笔者的视角主要针对中国，因此中国一级行政区的直辖市、省、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属于我们所谈的“地方”第二级的地区、自治州、盟，第三级的县、自治县、旗、自治旗、特区、林区，以及第四、第五级的各类行政区也均可视为地方。

文化区属于规范区，它分单文化要素的文化区（如语言文化区）和文化综合体、文化体系的文化区。如今各种媒体经常使用的“区域文化”概念实际上即指文化综合体或文化体系所分布的空间区域。先秦时期，中国的区域文化格局基本形成，经过若干世纪，这些区域文化不断演化发展，丰富、繁荣着中国传统文化。应该强调的是，尽管有些学者将区域文化区与某些行政区强行重合，但是我们不可忽视，在区域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每个区域文化区的边界都有变化，且由于区域与地方是不同的概念，所以这类文化区在空间上不会与本书中的“地方”完全重合。单要素的文化区的空间自组织性更不明显，因此也不会与本书的“地方”必然重合。我们此书的空间立脚点是站在“地方”上的，这意味着一个地方空间内可以存在不同区域文化的文化要素或文化特点，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本书才成为一本不完全等同于文化地理、文化志、文化人类学书籍的著作。

尽管“地方”不是一个“纯”地理概念，但是它依然是一个具有等级关系的空间体系，因此它们在空间范围上有大小区别、位置区别、资源丰度差别，这种差别甚至在相同级别的地方间也会存在。因此各个地方会有自己的特殊性，我们称之为“地方性”。虽然各

①也有学者意译为形式区，见王恩涌《文化地理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以及德·伯里著，王民等译《人文地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个地方有千差万别的特殊性，但是各个不同地方的行政长官与民众所面对的发展主题是一致的。

1.3 对发展的解释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必然。进入文明社会，人类由不自觉地发展状态过渡到自觉发展的阶段，如何发展、如何更快地发展就成为人们思考的主题。尽管学者们发现古希腊哲人、中国先贤的著作中有许多探讨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论述，古代祖先们发明并运用了许多利于资源持续利用的方法，但是人类整体上真正有意识地考虑持续发展还是 20 世纪后期的 20~30 年。由此，发展的概念从内涵到外延都有了新的内容，即社会各方面的进步，而以往所单方面强调的经济发展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过去人们更多地考虑经济系统的持续发展，强调经济系统的递增性、稳定性和协调性。其实经济系统是整个社会系统的一部分，或者说是我们上面所说的文化系统中的物质文化层。但制度文化层和精神文化层对经济系统的影响也会毫无疑问地决定着经济系统的发展。因此社会的全面发展是本书中“发展”的真正内涵。

社会发展应遵循三个原则：一是持续；二是协调；三是人本。人本就是以人为中心，以是否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判别标准。社会文明是可持续发展的本质特征，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主题有两个基本要点：一是强调当代人在追求生存与发展权利时，要保持其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二是强调当代人在创造和追求今世发展与消费的时候，应承认并努力使自己的发展机会与后代人的平等。

地方发展首先是社会发展，社会发展需要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进行改造。从宏观上说，社会发展需要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诸方面的改革大体同步配套进行。从微观上说，要抓社区建设、家庭文化建设。社区是文明的载体，是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社区建设是社会发展的前沿科学。但应该注意社区行政化之风不可

长。虽然社区离不开行政领导，但是社区也决不应该与政府重叠、耦合。社区是社会的分子，家庭是社区的原子。社区建设需要千家万户的参与，家庭需要在社区建设中增强归属感（邓伟志，1998）。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开展精神文明建设需要处理好五个关系：一是处理好经济建设和道德建设的关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坚定不移，但是如果轻视社会主义道德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忽视道德的相对独立性，最终也会对经济建设造成危害。二是要处理好价值取向和价值导向的关系。人们的价值取向是多元化的，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价值取向面临着相当复杂的冲突局面。因此在开展思想道德建设中不要导向单一，要注意层次性和针对性，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三是处理好社会理想与道德理想的关系。理想是人生的目标，社会理想是最高层次的思想境界，是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支柱。社会理想指导并制约着道德理想，社会理想是道德理想的源泉。如果一个地方的人群越是努力为实现自己认定的社会理想而奋斗，他们就会在走向理想人格品德的阶梯上攀登得越高。道德理想又是社会理想的基础，没有道德理想，社会理想就如同空中楼阁。因此既要重视社会理想的教育，又要重视道德理想的教育，而如今大力宣传的持续发展生态观等都是道德理想和社会理想结合的突破口。四是处理好建设和批判的关系。精神文明重在建设，这是中国本世纪经历的痛苦的经验。但这也并不是说可以完全放弃批判的方法，批判和借鉴有机地结合，也将有利于地方的持续发展。五是要处理好治标和治本的关系。即一方面要在全民开展文化建设、道德教育，另一方面要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坚持教育为主，并辅以法律手段作保证（石峰，1998）。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创新给全人类带来了福音。那么如何判断地方发展程度呢？目前流行的方法是综合指标体系判别法。就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而言，也可以用指标体系来判别，例如上

海制定的文明城区指标体系实际上就是衡量地方社会综合发展的指标体系。1998年仲夏,上海市文明办公室召开了创建文明城区指标体系的论证会,市委宣传部正式宣布,经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批准,上海市黄浦区被列为创建精神文明城区的试点区。制定这样的指标体系在全国是首创,它意味着人们已经意识到地方文化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是多方面的,既包括经济繁荣发达程度的硬指标,也包括文化教育领先、环境优美有序、服务保障完善、风尚文明向上等软指标。文明城区指标体系可以使地方政府对地方文化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科学化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也是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参考依据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文明城区指标体系的制定过程中,注重了人的全面发展(即“人本”的思想卫永成,1998)。

1.4 对本书方法论的说明

关于本书的方法论本不该在引论中赘言,但是我们希望能以较为简洁的文字道明我们的理论基点,并让读者能从本书的理论出发点出发,客观地看待文化与文化功能,有意识地、主动地参与地方文化建设,使个人在地方发展中起到积极的作用。

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泰勒、斯宾塞、卢伯克以及克鲁伯等人都将文化看作一个复杂的整体,或者将它视为一个全面的、不间断的连续统一体。不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在他们的眼中都是有具体特征的,都是真实的客观存在物。但是从20世纪30年代以后,一些文化社会学派(如美国文化族体心理学派等)由于受符号学派、心理学的影响,则将文化看作是个体心理的抽象物。爱德华·萨皮尔、罗思·本尼迪克特、莱斯利·怀特就是这种看法的代表人物(司马云杰,1986)。本书基本上是将文化视为客观的存在,探讨这些客观存在与地方发展的关系。但是在讨论文化扩散和文化遗产时,我们也同意怀特等人的看法,把文化放到人类社会

学关系中去理解，将文化作为人类集体经验的积累和行为方式。

由于本书将要讨论文化与地方发展的关系，因此作者必须回答“文化之作用”的问题，这或许也是读者最为关心的问题。按照功能学派学者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文化的价值“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满足人类的需要”；一切文化要素都是活动着的、发生作用而且是有用的”（马林诺夫斯基，1945）。马林诺夫斯基按照文化功能将文化要素进行了新的分类，一类是满足人们生理需要的文化要素，如衣食、艺术；另一类是满足社会调适的文化要素，如社会制度、风俗礼仪、道德、法律等。依照这样的分类，我们似乎只需要讨论满足社会调适的文化要素与地方发展的关系。实际上我们发现，任何文化要素都具有社会意义，它们对社会的发展都起着不同的作用。因此读者将发现我们本书讨论的文化虽侧重马林诺夫斯基后一类文化要素，但对第一类文化要素也给予了很多关注。取各家之所长，综合地研究文化与地方发展的关系是我们的理论出发点，也正是国际文化学界的研究趋势。

讨论地方文化与发展的问题，必然涉及中国文化的发展。文化的发展往往有“认同”与“离异”或“趋同”和“趋异”等两种不同的阶段。文化“认同”表现为与主流文化的一致和阐释，是文化在一定范围内向纵深发展，是对已成模式的进一步发掘，同时表现为对异己力量的排斥和压抑。其作用在于巩固主流文化已经确立的界限和范围，使之得以巩固和凝聚。文化的“离异”表现为批判和扬弃，即在一定时期内对主流文化的否定和怀疑，打乱既成的规范和界限，对被排斥的加以兼容，把被压抑的能量释放出来，因而形成对主流文化的冲击乃至颠覆。当“离异”或“趋异”占主导地位的阶段即文化的转型期。中国文化经历了三次转型期，即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直至今日。这三个时期也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大变革的时期。通常在文化转型期，对传统文化往往并存着三种力量，即文化的保守主义力量、文化的自由主义力量和文化的激进主义力量，这三种力量并存与同一个框架

中，它们之间的张力和搏击正是推动文化及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并且缺一不可（汤一介，1996）。因此本书中对传统文化中优劣之处的肯定与否定，并不代表我们站在保守、自由或激进的学术立场。

1.5 对写法的解释

本书在对地方文化及其发展关系进行讨论时，列举了大量现实中的例子，尤其是中国的例子，这正是本书的写作特点。采用这样的方法是因为本书涉及的一些文化理论较为抽象，需要藉具体的事例帮助我们讲明所述内容。然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分析的对象是人文现象，它的特点之一就是“千差万别”。目前社会科学界及人文学界出现了两种反思：其一是后结构主义批判中出现的认识论反思，这种反思针对的是现代社会科学的普同性解释范式以及把被观察事象归结为一种稳定的“有序结构”的方法论模式；其二是黑格尔以来的历史观的反思，它所针对的也是现代社会科学的普同理性解释范式，当然不是对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反思（王铭铭，1997）因此我们提醒读者 我们所列举的各个例子并不意味着给出了“普适模式”，它们仅仅说明现实的存在 为读者展开一片思考的天地。

第二章 地方文化发展的源泉 ——文化的创造与利用

地方发展需要地方精神文化力量的推动，而地方发展的实质就是地方文化的发展，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在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中国社会，各个地方的发展需要具有不断的创新性，开拓性。创新和开拓源自地方文化的内在力量，而不是由外界输入的。因此我们首先讨论的是地方文化的创造和利用。

2.1 地方文化要素及地方文化特征

文化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地方文化舞台上的演员。然而让我们说出我们扮演的一幕幕“戏剧”的特点是什么，与其他地方的人们扮演的“戏剧”有何区别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甚至无从谈起。文化学研究文化首先从文化要素或文化特征开始。

1. 地方文化要素

所谓文化要素是人类创造的各类文化内容如语言、信仰、宗教、习俗、社会组织形态等尽管它们在不同地方的表现形式可能很不同，但是各个地方文化都具备。各个地方文化都有自己的文化要素组合每个文化要素组合被称作文化综合体，一些相似的文化综合体又组合成文化体系。在中国不同的汉族文化区使用相同的文字但使用不同的方言各个文化区有大致相同的民间信仰和宗教，但在饮食上又有各地的特点，总之它们是不同的文化综合体。不同的文化综合体组成了中国文化体系。由此我们可以看

到，地方文化要素并不一定是某个地方独有的，那些区别于其他地方的文化要素则可视为地方文化特征。

在研究地方文化时，我们从何种角度考察地方文化呢？是从一个人，还是从人群的整体？文化地理研究中过去一向强调整体主义，即一个地区的人群文化具有统一的特点。还有的区域文化论著常常以某个个人的文化特征来代替其所处区域的文化特征，例如以荆柯侠义豪爽的性格作为燕赵大地的文化折射。实际上地区文化的共同性是在本区内人们相互间的不断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因此地区内人们交流的形式愈多样、内容愈丰富、交流愈频繁，愈利于地区文化的形成，或者说地区文化的整体性愈强。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现代人类学研究地区人群的“交换行为和交换规范理论”列维-斯特劳斯社会研究中的“交换形式、交往系统理论”都旨在分析地区文化的形成方式或途径。

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整体主义，它源于本世纪中期出现的哲学主体间性理论。在现代西方哲学中，鉴于存在主义主体性原则可能导致生存、行为中的唯我主义和人本主义分析，哲学家们纷纷转向主体间性这一领域。如卡尔纳普通过主体间性从“个体经验”实证原则转向具有“公共经验”的物理主义语言学实证原则。摩尔、奥斯汀和赖尔、威斯顿等人的日常语言学派、反对罗素等人的人工语言，强调日常言语交往具有情景中界定、考察词的意义，也关涉主体间的交往。特别是现象学大师胡塞尔，晚年一直致力于用主体间性学说改造和发展主体性理论，他认为主体性意味着自我，而主体间性意味着自我共同体，包含着集体主义、互助互为之意。他比较完整地阐述了主体间性理论。在胡塞尔的基础上，哈贝马斯针对人们长期把自我当作主体，把他人当作客体的“自我中心主义”倾向，推出了“互主体性”概念，认为人的主体性必须在交往中形成，必然走向“交互主体性”。

科学的整体主义是导向人类美好世界的指图标，是我们从个体主体性、群体主体性迈向类主体性 或人类主体性 的桥梁。陈金

美,1998)。我们在分析地方文化时既要关注群体,还要关注个体。

2. 地方文化特征

前面提到,某个地方区别于其他地方的文化要素就是它的文化特征。近年来国内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成果大体集中在三方面,一是综合的、理论性的研究;二是对各类文化进行纵向的研究;三是横向的区域研究,即地方文化特征的研究。中国幅员辽阔,风土各异,如果只是笼统地介绍“中国文化”,而忽视文化的区域差异,显然不能对所有文化现象进行透彻的解释,进而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取精用弘。因此注重文化的区域性研究已成为国内学术的新趋向。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这充分说明了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建设和地方发展的关系。

外国学者认为人类已经进入了“技术复制时代”(瓦尔特·本亚明)技术复制时代最重要的发明是大众传媒手段,如报纸、广播、电视和电影等。这些大众传媒不但加速了人们之间的信息沟通,而且成为大众生活,尤其是娱乐生活的重要依赖。当然这种传媒在空间上的超强覆盖性,使得由它们推出的“文化产品”迅速扩散到各地,并带动同类文化产品的制造,这样就迅速出现了某种空间上分布较广的“文化时髦现象”,甚至文化风格。例如,20世纪90年代末的中国,当一种文化产品在中央电视台或某地方电视台走红后,各个电视台纷纷仿效,如综艺节目、知识竞答节目、娱乐搞笑节目等。那么文化的地方性、地方风格如何体现呢?因此有人认为技术复制时代也是“文化工业”时代,即以工业方式生产文化艺术作品。带有标准化特征的文化艺术作品,无疑将破坏地方文化的自发活力或原创力,所以文化工业时代的最明显特点是“反文化”。面对这种担忧,有的学者分析,把全部文化产品的生产均工业化是根本不可能的,目前学术界讨论的文化工业实际上指的是

“大众文艺工业”，即利用现代技术大批量生产文化艺术中面向大众的那部分产品（邵牧君，1998）以我们的观点 技术复制时代所能够复制和工业化生产的仅是大众文化艺术产品中的一部分。从文化的产生发展规律来说，大众文化产生的真正动力在民间，而不是在媒体。即便是在大众艺术的产生过程中，真正的创作源泉也是在民间。例如中国不同地区的民间男女对歌、民间舞蹈、民间游戏娱乐形式等。对应于大众文化的是上层文化，也有学者将上层文化进一步划分为精英文化（士林文化）和宫廷文化，当然在中国这种对于上层文化的深入划分只适合传统社会。有些欧美学者错误地认为现代大众文化“一无是处”“观众是艺术的敌人”因此迎合观众的影视作品一定是“反文化”的，只有精英文化才能真正推动文化的发展。然而，世界文化的发展史充分说明，上层文化与大众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它们均要适合所处的社会环境，没有完全脱离大众文化的精英文化。

大众艺术产品的地方性在文化工业时代也是不会丧失的。尽管艺术产品属于文化结构中离自然界（地表圈层）较远的文化要素，这点我们在引言中已经讨论，但是它的地方性受它的载体——地方民众影响，越是人口流动较少的地方，地方文化个性保留得越持久。即便在发达地区，文化多元化的趋势也使地方文化特色得到强调。鲜明的地方文化特色不但不代表着保守，甚至可以使地方文化推陈出新，促进地方的凝聚力上升。

许多人有认识上的误解，总认为只有在较大范围的地区内才能体现文化的地方性 即只有在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华南、华东这样的区域内才可能体现文化的地方性。其实在不同尺度上的区域内都会有其地方性。那么如何挖掘地方文化特性，为地方发展服务就成为地方领导干部的任务。上海市徐汇区文化局在抓地方文化特色方面的一系列活动会给我们一些启示。徐汇区委和区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注重抓社区文化建设，1994年徐汇区的第一届老年服装比赛就引起了媒体的注意，上海电视台专门做了报道。同

年徐汇区的主题学校艺术节的作品荣获了上海少儿书画大赛团体总分第一。1997 年区内迎接香港回归祖国的大型庆祝活动就有 67 项 参加人数 15 万之多。整个社区的文化活动充满生机和活力。但是在整个上海社区文化建设的热潮中，他们发现社区文化建设必须具有各个地区的特点。这几年他们在以下具有本区特色的活动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力图突出社区文化的“地方性”。其一是“撞龙华晚钟”其二是“龙华庙会”这两项活动是以本区著名的宗教文化景观为依托的，同时借助了民间逛庙会的风俗。其三是“上海牡丹花会”其四是“上海桂花节”徐汇区位于上海闹市区外 相对有较多的公园绿地 故成为上海市区居民休闲的理想去处之一 这两个活动一个时值仲春，一个恰逢初秋 每年吸引游人达 10 余万人次。上述四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文化活动，不但促进了地方的旅游业、商业等经济建设的发展 同时锻炼了业余的社区文化工作者 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得到了社会的好评（郭仲英，1997）。

文化的地方性不仅仅体现在地方文化节庆活动中，还可以体现在地方性制度上。引言中介绍过中国的宗族制度在福建体现得比较明显，因此可以将之视为福建的地方性制度。1949 年至 1979 年实行“集体化”的时期里 政府的公有经济制度取代了原有的私有经济制度 也有学者认为这个过程也是政府的“公经济”取代“家族”“公经济”的过程（王铭铭，1997）。在宗族制度占突出地位的福建地方 原来的社会互助网络是以家族或宗族、姻亲关系网络为基础的。集体化后，政府也在某种程度上承担起了社会福利的责任，当某个个人或家庭遇到困难时 即便是在贫困的农村 作为政府代表的生产队长也会召集生产队员们进行尽可能的互助。这样的互助形式使得原有的地方宗族制度随之衰落。1979 年改革以后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使许多地方出现了新的合作与互助问题。经济改革导致家庭经济的复兴，也使得政府“公有”力量部分削减，尤其是政府以往对经济合作和地方公益事业直接干预被

取消 不仅生产成为个人 - 家庭的事 公益事业和社会互助亦变成民间的事情。这一状况为地方宗族传统制度的恢复提供了一个“自由的空间”(王铭铭,1997)。这个例子告诉人们 地方性制度的存在是和与之相关的其它地方文化要素互相依存的。人们在挖掘地方文化特征时必须考虑到此文化特征是否与当地的其他文化相协调,如不是,那么这种文化特征就是过时的或超前的。地方文化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系统,人们作为系统的组成部分,既要积极地推动系统的发展,同时又要积极地认识它。

3. 社会需求与地方文化要素及制度的变革

正如功能主义认为的,一个文化中的每一个要素和制度都行使着一个特别的任务,使社会体系凝合在一起,一个社会的结构是由特质和制度实现社会的需要而决定的。这个观点为一方父母官或政策咨询机构提供了一个思考问题的视角,即分析一个地方的文化要素和文化制度要考虑两种社会需求。其一是历史社会需求,它决定了目前地方文化要素、文化制度的特点;其二是目前和未来社会需求,最简单地描述这种社会需求就是第四章中提到的“可持续发展”。考察两种社会需求之间是否有不一致、不协调的方面。如果没有,那么现有的文化要素和文化制度需要进行的变革较小;如果有不一致的地方(在较长的时段内,这是绝对的情况),那么就需要对文化要素和文化制度进行适度的变革,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中国各地推广普通话就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例子。中国地域辽阔,幅员广大,除少数民族外,绝大多数地区和绝大多数人口均使用汉语。但汉语在各地有不同的方言如北方方言、吴语、闽语、粤语、湘语、客家话、赣语等而且由于地理阻隔、历史文化等原因,各地方言之间的差别很大,尽管如此,“同书同文”的汉字使得会认会写汉字的人(主要是官员和知识分子)可以互相交流,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几千年文明历史得以流传

下来 应当归因于汉字和汉语 董琨,1991)。其实汉语的作用和功绩远不止于记录了历史,更在于它促进了不同地区人们的交流,使得中国历史上政权分分合合却始终没有彻底分裂为几个独立发展的国家。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人类进入了信息的时代,人们业已清醒地意识到没有交流就没有发展。就中国而言,在尊重各个民族语言的同时,国家还做了许多努力促进不同语言间的文化交流,最为人们熟知的就是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长期以来所做的工作。该委员会在推广普通话方面的努力就属于我们所说的文化要素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例子。自 1956 年始,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多次发表《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对不同方言中的异读字进行了定音,减少了交流和使用中的困难。随着普通话的推广,人们日益看到这项工作的意义,它不仅有利于广播、电视等媒体实效覆盖范围的扩大和教学、科研、行政管理等交流的顺畅,而且在计算机普及时代扩大了信息的交往和计算机辅助工具用户。

文化是人造的第二自然界,人类创造了文化,反过来文化又影响和制约着人类自身。正如前面提到的,文化分为器物层、制度层和观念层。器物层的变化是社会发展的原始动力,同时它又需要制度层和观念层随之变化。反过来,制度文化层和观念文化层又影响和制约着器物文化层的发展。地方发展的目标之一就是器物文化层的发展,它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较快的制度和观念文化变革,对器物文化的发展无疑是有利的。观念更新对于一个民族的生存、一个地方的发展至关重要,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现代化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观念的现代化,“先化人 后化物”观念现代化的本质是一个文化领域的问题。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许多宝贵的财富利于人们的观念更新。

“积极进取 自强不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 也是中华民族创新精神的一种体现。历史上自强精神不仅铸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而且激励着华夏子孙不断进取、不断创新。

“注重整体思维,讲究综合创新”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

征和优良传统。早在 3000 多年前 古圣先贤的著作中和许多巨大的工程实践中，就已经提出和体现了朴素的整体思想。在各科自然科学高度分化时，当代科学技术又出现了整体化和综合化的趋势 新的综合学科和横向学科逐渐出现 这说明了现代科学的整体化发展趋势。在整体化前提下的创新思维才是最有价值和意义的，这种整体思维和综合创新对确定全面的地方发展方向也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孜孜不倦，勇于开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另一优良传统。中国文化鼓励人们不能尽信书，同时还要求人们读书治学时要敢于议前辈 立新说 既尊重前人 又不迷信前人 既勤虚心 又敢议敢论 勇于创新 冯之浚,1998)

当然中国文化中也有对创新精神的负面影响，例如董仲舒的“天不变 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 以及不思进取 耻于竞争等守旧观念，都束缚着中国创新精神的培养。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长期农业社会的存在和影响。中国自古以来便是农业立国 对封建统治者而言 农业是本 工商业是末。“强本抑末”使工商业得不到发展。简单的社会经济结构从物质或器物文化方面不能向科学技术提出广泛的新要求，也不能提供有力的研究工具，因此没有形成近代科学技术创新的条件。

第二 传统文化中的保守倾向。孔子教导人“乐天知命”以及前面提到的“天不变 道亦不变”成为长期以来中华民族思想、行为保守的总纲和理论依据。同时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注重笼统的整体直观 这样也不利于思维的精确化 只重“意念” 不重“印证” 亦不能激发创新精神 并阻碍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

第三，科举制度压抑了创新精神。科举制度诱使士人死读书，一味寻章摘句 不务实学。唐宋科举以辞赋、经义取士 使得天文、地理、水利、农学等学科被偏废 严重抑制士人在实用科学发展上的创新。明清两代科举以八股取士，要求考生依据朱子对四书